



提升宏观经济治理的精准性系统性开放性

□ 李江涛

2022年3月以来,受新一轮疫情等超预期因素冲击,我国经济增速出现一定回落。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不断完善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在关键时刻充分发挥了支撑性作用。2022年二季度经济总体实现正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2.5%。同时,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服务业生产指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财政收入等重要指标都实现了回升,就业和物价总体稳定、外贸较好外储稳定、产业升级态势持续、夏粮喜获丰收,均证明了我国经济韧性足、潜力大、空间广的特点没有改变,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但是,这与6%左右经济潜在增长率、与人民群众期望的理想生产生活目标、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关于速度、规模、结构的要求仍存在较大差距。如何在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下,不断提升宏观经济治理的精准性、系统性、开放性,对于强化我国经济的韧性、释放经济潜力等具有重要意义。

宏观经济治理的精准性

针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以更加精准化的宏观调控手段,提升逆周期调节能力,构成了近期宏观经济治理的核心内容。虽然我国经济承受住了近年来国际和国内各类重大事件的冲击,表现出了较强的“韧性”,然而,关于“韧性”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保持稳定性,一直存在某些疑虑和争议。也就是说,保持经济运行良好的平稳性,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大问题,是当前对经济韧性实现有效预期管理的关键。

现阶段,需要着力解决市场主体生产经营困难问题、重点群体的就业问题、稳定物价水平、扩大消费和投

资、打通产业链供应链堵点等,是实现经济运行向着正常轨道回归和保持经济韧性的关键所在。对此,尽管所实施的发行专项债券、大规模留抵退税和其他减税降费政策,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实施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做好能源资源保供稳价工作,以及就业、投资、消费、产业等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成效十分明显,但“向好”态势和经济持续恢复基础仍有待进一步稳固。这既有国内疫情因素叠加结构性矛盾和周期性问题的内生根源,亦有全球经济滞胀风险上升,主要经济体政策趋向收紧,叠加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外部原因。

未来一个时期,以做好“六稳”“六保”工作为基础,夯实经济韧性需要在落实已确定政策的同时,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是抓紧谋划增量政策工具。尤其要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外贸政策等方面,通过探索新的基建融资工具,发行消费券,推出居民消费和科技创新专项再贷款,针对文旅、餐饮等困难行业以及低收入群体的一揽子支持政策等,不断丰富宏观调控政策工具箱。二是加大相机调控力度,把握好目标导向下各种政策工具的提前量和冗余度。国内外环境日益增强的不确定性,加剧了经济运行波动的反复性。这就需要尽最大努力稳定市场预期,着眼于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的长期化,提升相机调控的精准性,充分考虑政策的传导效应,适度提前、留有冗余,加大存量和增量政策的实施力度。

宏观经济治理的系统性

短期调控与长期目标兼顾是我国宏

观经济治理的重要特色。当前复杂国际国内环境所蕴含的重大风险因素可能呈现“长期化”趋势。输入性通胀、资本外流、大宗及关键商品的供应链中断等风险可能在较长时期内影响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单纯强调较多关注逆周期调节的宏观调控,强化宏观经济治理的系统性同样重要。既要稳住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盘,也要立足于“十四五”等长期目标来提升我国经济韧性。

为此,当前的宏观经济治理应坚持以下原则。一是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主要指标所体现出的上半年经济成效,已经构成了外部环境 and 疫情形势中的一次重大增长压力测试。我国在货币政策、投资政策、消费政策等领域都没有搞“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这也是我国有效避免了西方国家数十年来最严重通胀局面的重要原因。不搞“大水漫灌”应成为今后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方针。二是做好跨周期政策设计。提高经济预测水平,在最大限度上进行跨周期政策设计,努力延展宏观调控政策的效应时间,管理好公众和社会的未来预期,是支撑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增长的重要手段。三是综合运用“1+2+N”的宏观经济治理工具箱。坚持以“1”即国家发展战略规划为导向,充分运用“2”个主要手段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时发挥就业、产业、投资、消费、区域等一系列政策工具的支撑作用,从而形成系统化、管长远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四是继续在缩小城乡、区域、产业链差距上做文章。提升农村和后进地区的消费能力,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不仅是共

同富裕的客观要求,也是经济内生增长的主要动力源。留住并完善产业链,继续保持强大而高效率的生产制造能力,并努力实现产业向中高端攀升,是经济行稳致远的物质基础。

宏观经济治理的开放性

开放合作共赢是永恒主题。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韧性厚实度的不断增强,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进程中实现的;另一方面,无论具体形式和途径如何变化,新发展阶段的全球化力量仍将是进一步厚植我国经济韧性的关键性支撑。2022年上半年,19.8万亿元人民币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和9.4%的同比增速,保住了全国外贸增长的基本盘,奠定了稳住经济增长和就业基本盘的基础,充分体现出开放条件下愈加厚实

的经济韧性促进自身更加稳定的鲜明特点。事实证明,近年来西方国家的自身利益优先原则和以邻为壑的宏观经济政策,形成了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与其自身经济韧性的双重损害,激化着其内部各种宏观经济矛盾的爆发。中国经济发展离不开全球经济复苏和繁荣。中国与世界已经形成了深度融合、相互依存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在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坚持多边主义而非以邻为壑,坚持以我为主而非依赖他人,努力推动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是新发展阶段厚植我国经济韧性的必然选择。唯有如此,才能争取到更多国家支持,在动荡变革时代塑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以更为“韧性”的经济能力,延长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理性看待产业园区“泡沫”

□ 聂佃忠 孙即才

近年来,我国产业园区快速发展,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产业园区是指由政府或企业为实现产业发展目标而创立的特殊区位优势环境,是区域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的重要空间聚集形式,担负着聚集创新资源、培育新兴产业、推动城市化建设等一系列重要使命,对促进体制改革、改善投资环境、引导产业集聚、推动高质量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在此背景下,产业园区在发展中也面临诸多共性和个性问题,特别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日趋凸显。比如,在一些地方园区由于产业迭代速度过快导致园区的“产业塌陷”,导致园区空心化而失去活力出现“泡沫”现象。

目前,我国园区经济发展日趋完善、日渐成熟,现已形成了产业园区发展的特有运营模式,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着“火车头”“增长极”“风向标”作用。当前,我国各类产业园区发展态势良好。以国家级经济开发区为例,即便是遭受疫情冲击的2021年,全国230家国家级经济开发区生产总值13.7万亿元,同比增长15.4%,增幅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7.3个百分点,占同期全国GDP比重不降反增,高达11.9%。再以国家级高新区为例,2021年全国169家国家级高新区生产总值达到15.3万亿元,同比增长12.8%,占2021年全国GDP的13.4%;利润总额4.2万亿元,同比增

长17%左右;出口总额5.1万亿元,同比增长13.3%。此外,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占全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为50.4%,技术服务出口总额占全国服务出口比重为15.1%。因此,国内产业园区发展的基本面是好的。尽管在新冠肺炎疫情和“逆全球化”等冲击下,产业园区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挑战,但总体上看是产业园区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正常”问题,具体表现为中西部产业园区快速推进与创新发展的的问题,以及东部地区产业园区转型升级发展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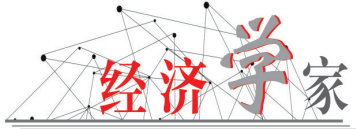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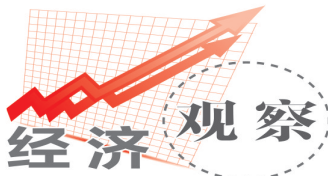
从全国的情况来看,尤其是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产业园区发展中出现的共性问题。一是规划布局不优。园区规划布局缺乏“一盘棋”思想,普遍存在区域比较优势不明显、主导产业不突出、特色不鲜明等问题;一些园区规划缺乏前瞻性、指导性,存在一定的行政意志和以商定规现象,造成了同质化竞争、无序竞争、恶性竞争现象。二是创新动力不强。园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普遍存在着整体建设水平不高、科技创新综合能力不足、人才引进和培养滞后、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弱、科技创新平台缺乏、科技创新和管理水平有待提升等诸多问题。三是体制机制不活。当前园区管委会都是由政府抽调人员进行管理,受体制编制限制,管理人员数量相对较少,管理能力和水平不高,市场化运作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四是融资渠道不多。企业直接融资渠道狭窄,投融资体系还不健全,社会资本参与产业投资的积极性不高,尚未形成一套多元化投融资体系;入驻企业多数规模小、盈利少、资产质量差,

担保能力和中短期还款承担能力差。五是专业人才不足。主要体现在技术创新人才相对匮乏,缺乏创新人才聚集应有的平台和渠道,特别是缺乏创新型技术人才、实用型技能人才和管理型实用人才,严重影响了园区科技创新活力和可持续发展。

为此,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应进一步完善开发区软硬件环境,加强开发区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建设,增强产业发展动力。一是完善规划布局。按照“一区一主导产业”原则,打造具有区域性品牌优势、特色鲜明、一主多元、错位发展、带动性强的现代产业园区和现代产业集群。产业园区应以“补链”“延链”“强链”为主,注重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产业弱区则从从无到有“建链”为主,逐渐形成“专、精、特、新”特色产业链。二是健全体制机制。从园区发展实际出发,按照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理念,在经营服务上挖潜和发挥市场的功能,建立“决策机构一元化、管理机构行政化、服务机构企业化”的扁平式直线职能型管委会组织结构。三是拓宽融资渠道。除了财政资金、银行贷款、企业上市,积极探索和推行多元化投融资方式。四是激发创新动力。大力支持推进国家创新驱动可持续发展战略与各地产业园区发展战略进行深度融合,构建现代产业科技创新保障体系,建立和完善园区科技成果转化保障体系。五是集聚专业人才。始终坚持将产业领域高端科技人才的引进与本土现代化人才培养工作并重,聚集一批从事现代产业科技服务领域的战略性高端科技人才、科技创新领军人才、青年高端科技人

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到基地和示范区开展服务和创业;鼓励园区吸引和汇聚国家科研机构、高等学校、重点企业和社会的力量,建立一批专业化人才和培训基地。

从东部地区来看,产业园区暴露出注重优惠政策、侧重加工型高新区、强调引进大型公司、单纯土地运营、园区功能过于单一等一系列问题,园区需在发展产业集群、研发型高新区、科技型中小企业集群、现代化综合功能区等方面转型升级。为此,需从以下三个方面转型升级,增强开发区发展的内生动力,培育有全球影响力的制造研发基地,提高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一是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推动产业园区集约化转型升级。二是新工业革命技术与智能制造应用,推动产业园区智能化转型升级。三是体制机制创新与融资改革,推动产业园区高效化、平台化转型升级。在经历了前三个阶段的发展之后,国家对产业园区开发的重心将向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功能完善、绿色发展方向转变,控制园区数量的同时鼓励不同地区产业园区探索转型升级的路径和模式,推进产业园区形成各具特色的先进智能体系。



王 东京

研究经济学数十年,我从未见过有哪位经济学家否认货币的作用。当年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其中关于“货币作用”的名言,我至今能背得出原文。马克思说:在社会资本再生产中,“货币表现为发动整个过程的第一推动力”;并指出,对每一个新开办的企业来说,货币是“第一推动力和持续的动力”。

货币作为商品的一般等价物,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世界货币”等五大职能。事实上,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一切商品交换皆离不开货币,在经济生活中,货币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大概也是西方国家为何遇到每次经济衰退时,皆要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原因。

往前追溯。上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发生经济大萧条。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他所开出的药方,是国家干预经济,即用扩张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投资公共工程,扩大内需。此一主张,一度成为欧美国家的国策,凯恩斯也因此被誉为战后经济繁荣之父。然而到了上世纪70年代,西方世界却普遍陷入了滞胀。于是凯恩斯的理论遭到众多批评,千夫所指,四面楚歌。

2007年,美国又发生了次贷危机。面对大规模失业,奥巴马政府再次采用凯恩斯的理论,一方面推行赤字预算(发国债);另一方面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可遗憾的是,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经济并无明显起色;特朗普上台后,改用供给学派的主张,大刀阔斧地减税,并将公司所得税率从35%降至21%,最近几年,美国经济才逐步有所恢复。

再看中国,2008年,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国内不少中小企业停产歇业,当时有近2000万农民工提前下岗返乡。为了稳企业保就业,同年11月,国务院推出了4万亿扩需计划,重点投资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现在回过

头看,4万亿扩需计划对缓解次贷危机冲击,效果的确立竿见影,但同时也让我们进入了漫长的“前期政策消化期”。从上面的例子可见,货币既能推动经济发展,但也有负作用,甚至可能闯祸。若站在企业的角度,这样讲似乎不太好理解。对单个企业来说,货币作为商品的固定等价物,手里的货币越多,调动资源的能力就越强,货币当然越多越好。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货币是企业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动力。

但若从宏观角度看,货币并非多多益善。何以见得?对此需要我们理解“货币”与“资本”的区别。马克思讲得很清楚,资本是不断增值的价值,其“实物形态”是各种生产要素(商品);“价值形态”则表现为一定数量的货币。这就是说,货币本身并非资本,特别是当金银货币退出流通后,货币只是资本的纸制副本。

是的,货币与资本不是一回事。若读者不信,可以去读《资本论》,你会发现马克思说“货币是第一推动力”,那里的“货币”其实是指“货币资本”,而不是指纸币(钱)。当一国发行的货币等于商品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时,货币是资本。若货币超发,不仅不会增值、引发通胀。

让我举个例子解释。根据货币流通公式:流通中所需要

论货币推动力

的货币量=一定时期社会商品价格总额/同名货币流通速度。假定商品价格总额为50万亿元,货币流通速度5次/年,则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为10万亿元。假定央行发行了12万亿元的货币,那么这多发的2万亿元没有对应的商品,就只是钱,而不是资本。

读者看明白没有?资本是不断增值的价值,而纸币发多了会贬值,所以我们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我在前面说过,作为经济第一推动力的货币,指的是货币资本;而且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分析,货币要发挥对经济的推动作用,至少应具备以下三大前提。

前提一:货币供求要保持总量平衡。在金银货币流通的前提下,货币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而当纸币替代金银货币流通后,若货币供给大于需求,必然导致通胀。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则弊大于利,会给经济带来不利的后果。

前提二:商品供求要同时保持总量与结构平衡。经济理论与经济发展史皆表明,货币是中性的,货币调节属于总量调节,解决不了结构问题。当供给短缺时,增加货币投放只会拉动价格上涨;而当供给过剩时,多发货币也只会火上浇油,加剧生产过剩与结构失衡。

前提三:货币资源的分配应由市场起决定作用。有两个重点:一是要尊重市场“等价交换”规则,政府不能管价格;二是要放开市场利率。对某些需要扶持的企业,政府可用财政贴息的办法予以支持,不可用行政手段控制利率。只有让市场化利率引导资金流动,才能将好钢用在刀刃上,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

回到中国的现实,我提三点建议:第一,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财政政策可靠前发力,重点减税,但货币政策则应继续保持稳健,绝不能搞大水漫灌;第二,为了保就业与民生,应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把扩大内需与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坚持从供给侧发力扩内需;第三,应重视GDP增速,但不必纠结5.5%的速度指标,要保持定力,坚持速度服从质量,把高质量发展放在首位。